

延迟退休不是养老金的救命稻草

张枫逸 公务员

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戴相龙7日在参加博鳌论坛时表示,养老金确有缺口,并建议通过延长退休年龄、加大国有资产划拨社保的力度等方式弥补,并逐步形成政府、企业和个人账户共同组成的养老金制度。(4月8日《新京报》)

由于我国社保制度建立较晚,很多退休人员没有交费参保,需要依靠在职人员的缴费来发放养老金,从而导致后者个人账户出现空账。《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》显示,2011年有14个省份养老金收不抵支,收支缺口达766.5亿元。

对此,有专家学者开出了延迟退休的药方,甚至勾勒出“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,我国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、减支160亿元,减缓基金缺口约200亿元”的蓝图。乍一看,只要退休年龄延长三五岁,养老金缺口就可迎刃而解。然而,解决现实问题并非做数学题这么简单。

首先,延迟退休是个系统性工程,硬币的另一面是对劳动力就业的冲击。数据显示,目前我国每年约有300万左右的人退休,新增就业机会1000万左右,如果延迟退休,就业机会就会减少30%。在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当下,很可能摁下养老金缺口的“葫芦”,浮起稳定就业

的“瓢”。

其次,延迟退休对于不同利益群体影响不一。公务员工作轻松,乐于多于几十年获得更多的津贴和各种福利,但对于许多企业人员来说则不然。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指出,男性50岁以上、女性45岁以上的企业工人,因年龄和体力问题,存在一个“就业困难期”甚至是“就业断档期”。最现实的希望就是早日拿到退休金,可以有一笔稳定的经济来源,但延迟退休使“困难”和“断档”的时间又增加5年,而且还要继续交纳保险费,显然难以承受。

诚然,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预期寿命的延长,延迟退休是大势所趋,但其

并非养老金的救命稻草,而更像一杯美丽的毒酒,只能饮鸩止渴,遗患无穷。

养老金缺口的形成,从根本上讲是政府投入不足和“双轨”制度缺陷造成的。一方面,社会保障支出仅占我国财政支出的12%,远低于西方国家30%—50%的比例,即使是一些中等收入国家,这一比例也在20%以上。财政投入不足,使得有关部门只能优先为退休者发放养老金,而无力解决历史欠账问题。同时,我国公务员不用缴费,养老金保障水平却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,财政负担压力巨大,直接影响了社保储备基金的盘子做大。解铃还须系铃人,填补资金缺口不能让公众来埋单,需要政府承担更大责任,

切实提高社保投入,尽快革除“双轨”弊病,打通养老体系的任督二脉。

有形的缺口需要填补,无形的漏斗更要关注。目前,大部分养老基金只是放在银行吃利息,没有采取市场化的投资运营方式,收益率跑不过CIP使得养老金存在明增暗亏之虞;与发达国家的基本养老金、企业年金和个人商业保险“三条腿”走路相比,我国只是基本养老保险“一条腿”前行,在不断加快的老龄化社会面前愈发独木难支。在解决历史欠账问题的同时,有关部门还需有前瞻思维,通过多元化投资化解贬值风险,拓宽养老资金渠道引来源头活水,从而保障公众救命钱、幸福钱的充盈富裕。

“人的城市化”道出了城镇化的真谛

贾志勇 公务员

4月8日,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,城镇化是人的城市化。(4月8日网易财经)

笔者以为,樊纲的上述观点,道出了城镇化的真谛。如果政府把城镇化简单定位为城市的城镇化,那么未来发展趋势,不过呈现为一种“摊大饼”模式。这样的城镇化,只会是表面上看到的城市面积越来越大,城市高楼林立,硬件一流,但城市软环境、软设施将严重欠缺。人民群众在城市里的幸福感,将面临威胁。

一言以蔽之,这是低水平、低质量的城镇化,而不是高水平、高质量的城镇化。这样的城镇化,同时也一定是不成熟的城镇化,难以获得良性、持续发展。其令人最大的担忧,是城市居民难以真正融入城

市,生活危机感重,时刻有被逼离城市的凶险,人人内心充溢着漂泊感、无依感。

城镇化而忽视人,忽视人的生存状况、幸福感,更涉嫌城市对人的权益侵占,劳动力的压榨。同时加剧既有城市与临近区域的割裂,城市周边群众将遭遇“被上楼”,被进城、进社区惨状。这类人如此简单地由农民变市民,将得不到切实的政策保障、收入保障以及包括劳保、医疗、教育之类的城市福利保障。这显然会造成城镇化后的城市,内部矛盾重重,难以调和,最终提升城市运行成本,进而威胁到社会的稳定,经济的发展。

认识到城镇化是“人的城市化”,首先一点在于城市能够留住新进入的社会阶层或群体,并使其迅速成为城市一员,不被歧视,不遭遇城市壁垒,没有融入难的尴尬。这在于城市能够积极为这些城市

“新人”搭建平台,尤其注重相关保护政策及体制机制的研究谋划,能够提供及时有效的保护。

其次,是确保有劳动能力的城市“新人”迅速成长,能够真正获得城市生存本领或技能,促进他们在城市就业、创业,实现人生价值。同时,对部分失能人员提供尽可能足够、尽可能宽裕的日常生活条件,让他们在城市活出足够的体面和尊严。

这两点其实是相辅相成的,二者缺一不可。而无论欲实现其中哪一点,都离不开城市拿出诚意与诚信,持一种反哺、回馈的态度,让城市“新人”没有后顾之忧。这是个关键性前提,或是城镇化的成本,抑或是基本的代价。如此,才会使得中国的社会更加稳定,各项事业更加进步,能够奠定未来发展的基础,真正让中国从城镇化中获益。

戏·画·闲·言

企业买车官员用 安得公仆节俭风？

吴之如 文/图

自去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、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后,城市高档娱乐场所门前的公车的确大大减少。是政府官员真的减少了应酬吗?一位国企司机高师傅向《中国企业报》记者道出了其中的玄机:“国家一直在监督查处公车私用问题,但现在的政府官员用车已经由地上转移到地下了,政府的公车虽然入库了,但企业的公车却在快速增加。用车的是政府官员,买车养车的却是企业。”(4月9日《中国企业报》)

时下,在反腐败和反奢华浪费的潮流中,有些地方和部门“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”的习惯性反应似乎也在不断地变换发展着。譬如政府部门限制豪华轿车、公仆不得公车私用,相关纪律和规章越来越严格,这让一些大手大脚享乐惯了的权势人物颇不自在,于是脑筋一转,变通的点子就出来了。政府官员运用权力影响,让管辖的企业出钱买车养车,给自

己乘用,又风光又方便,就成了既实惠又能避开纪律监管的妙方。

爆料司机称,与企业有直接关系的政府官员,是企业公关的重点,为了保持亲密关系和联络方便,企业会主动为其购买专车并聘任专职司机。还有一些官员会暗示企业提供“补助”,例如:似是无意间感叹开公车不方便,实则暗示企业想办法。最终,企业常年报销其私家车之汽油费、过桥费、保养费和维修费等。可见,这一现象,其实就是官商钱交易的一个变相表现,

与其他暗箱操作的交换形式一样,都属于腐败范畴。有道是:

企业买车官员用,豪华气派乐无穷;百姓冷眼多抱怨,安得公仆节俭风?

公家人办私事变着法子用公车,看来事小,却关乎民众感受,不可小视啊。



“万人坑”遗址岂能卖掉盖楼

江德斌 自由撰稿人

历史不该被遗忘。1940年至1945年,侵华日军在山东济南留下一座“万人坑”,中日建交后陆续有日本老兵来中国祭拜当年的遇害者。日前“万人坑”遗址土地将要被开发成商业住宅,开发商因纪念碑太碍眼派人把碑清走。日本老兵很可能再无机会祭拜“万人坑”。(据4月9日《济南时报》)

这是一个令人发指的新闻。“万人坑”原本是死难同胞的骸骨遗址,且已被列入济南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,理应依法予以保护,供后人凭吊缅怀,以纪念遇难者。然而,“万人坑”遗址却被卖掉,纪念碑被清理走,甚至还要在遗址上盖大楼,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如此做法显然是抹杀历史记忆,违反遗址保护法规,漠视遇难同胞,情理不容,亦不可原谅。

由报道可知,济南“万人坑”遗址所在原属一家国有企业,厂区土地乃是国家划拨用地,而在兼并重组之后,已变成民营企业,土地亦随之被变更规划,成为商住用地。可见,“万人坑”遗址要被商业开发利用,乃是经由合法程序审批通过,不能将板子只打在企业身上,亦需追问相关部门的责任。

此次失踪的是1952年立在“万人坑”原址的旧石碑,而在1990年企业盖办公大楼时,亦曾树立起一块新碑,二十多年来遗址上未再挖过土。显见当时已认识到“万人坑”遗址的重要历史价值,但在被列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时,却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,将其从厂区土地里单独划开,交由市政府来管辖,以至埋下今日的隐患。

而且,济南市政府部门在土地规划变更中存在的问题,也需要加以调查和追

责。对于“万人坑”这种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遗址,理应按照相关法律予以保护,即便出现土地使用权转让,也无法改变其土地国有的性质,应依法收归政府接管,而不是将其变更为商住用地。那么,在此次土地规划变更中,是否存在着腐败利益交易,程序是否违规,需要相关部门尽快介入调查,给公众一个明白的交待。

不是所有的土地都能卖掉盖楼。“万人坑”遗址是用于纪念历史创伤的,不能拿去卖钱,这是非常简单的常识,为何却被政府部门所漠视?现在全国各地城市热衷搞开发建设,却忽视对历史文化遗址的保护,甚至于公然肆意破坏,抹去了历史记忆,所造成的民族精神损失,也非金钱所能衡量。莫要到了需要纪念的时候,才发现,我们已经找不到可供纪念的遗址了,那才是最大的悲剧。

憧憬国企分红 不如完善回馈制度

张涛 老龄工作者

2012年两会期间,全国人大代表王填提出议案:用两年国企利润向全民分红,发放四万亿“消费券”。对此,发改委回应: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发放消费券是否可行还需要进一步论证。(4月9日《中国经济周刊》)

国企本身具有国有属性,全部收益归全体国民,就此而言,将国企利润通过消费券的形式向全民分红似乎顺理成章。尤其在近年来国企尽享垄断地位和优惠政策的福利待遇的背景下,公众也乐于这种“打土豪,分田地”的快意恩仇。新浪网调查显示,超过八成的网友表示支持。

乍一看,国企分红的确很美,既能调节社会收入差距,又能提振民众消费底气,然而,这在现实中可能遭遇一系列问题,很可能让政策善意跑偏,甚至事与愿违。

首先,权力寻租难保公平。有利益的地方就有寻租的魅影。每人每年1500元的消费券,又如何保证不被既得利益者截留挪用?为了全民分红,我们势必付出大量的管理成本、监督成本,却也未必真正做到公平公正。

其次,短效措施难振消费。刺激消费从根本上要靠老百姓收入的增加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,在人们普遍有钱不敢花的当下,发放消费券只不过是替换了原本准备消费的那部分现金,实际消费并没有增加。甚至,这样天上掉馅饼的美食还会吊高公众的胃口,有消费券时消费,没消费券时观望。

当然,国企利润理应全民共享,但

全民分红并不是一个好主意。与其空谈不切实际的分红,不如俯下身子研究如何更好地回馈社会。事实上,我们不乏相关回馈制度。过去,政府一度为了“激励企业改革和发展”暂停向国有企业收缴利润,随着国有企业总体走出困境,2007年12月,财政部和国资委制定发布了《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》,重新启动国企向国家上缴利润政策。

然而,现行政策的两大弊端一直备受诟病。其一,上缴比例过低,根据规定,按照类别的不同,国企向国资委上缴其利润的10%和5%,而欧洲国家的这一比例为50%。大量的利润没有回馈给国家,而是继续留在国企,滋生出天价酒、天价吊灯等奢侈丑闻,供养着超出社会平均工资100多倍的高管福利。其二,没有惠及民生。国外的通行做法是,国有股东的代表都被要求将国有企业的红利转给财政部门,用于公共支出。但在我国,这少得可怜的上缴利润,大多又以补贴等形式回到国有企业。2012年中央国有资本支出预算安排显示,计划全年支出的875.07亿元国有资本中,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保等民生支出的金额,仅为50亿元,占全部支出的5.71%。

国企利润难以有效回馈社会,既有悖于其国有属性,拉大了贫富差距,也对民营企业发展造成不公。当下,亟待完善回馈制度,一方面大幅提高上缴比例,让国企创造的财富更多地回流到政府手中;同时,规范红利支配,专项用于社保、教育、医疗等民生开支,真正做到取之于民,用之于民。

“菠萝科学奖” 激活创新思维

雷弘霖 教育工作者

4月9日《成都晚报》报道,去年,搞笑又严肃的“菠萝科学奖”横空出世,使得另类科学研究迅速进入大众视野。日前,这个被称为中国版“搞笑诺贝尔奖”再次席卷而来,今年的各大奖项依然令人叹为观止,除公鸡鹅的脱肛上有求偶利器,追女生通过数学模型就能按图索骥等研究外,西南交通大学的毕业生赵尹龙因设计鼻涕收集器,获得“发明奖”。这个奖给大家一个启示:表面上看似荒诞的研究,只要坚持下去,一定会有所收获和成就。

应该用欣赏的眼光看待“菠萝科学奖”——搞怪奖,因为正是有了这种“怪”,我们才跳出了“中规中矩”、平常的思维局限和模式化现状,发散性、出其不意的另类角度,才能得到自然迸发,迂回曲折、抵制常态、打破传统,大胆追求另类和新颖。这才是一种别具一格、颠覆传统、难能可贵的创新、创造萌芽。如果在现实生活中,我们能多一些这样的搞怪思维、标新立异,我们的科技创新以及诸多研究成果,肯定能得到意想不到的突飞猛进。

人类的发明创新过程,就是一个颠覆性的怪异思维的裂变过程。没有奇思怪想、另类荒诞思维,人类就不可能大踏步发展。比如瓦特的异想天开成就了蒸汽机,哥伦布远航当时被认为是疯子。美国一位教师曾让学生做过一个大胆想象,二十年后,你认为世界是什么样?二十年后,有相当一部分所谓的“怪想”比如电脑、飞机、宇宙飞船都得到了实现。怪异中往往有不容忽视的创造潜能。发明家保尔·麦克克里德说:“唯一愚蠢的问题是你不问问题”。“没有做不到,只有想不到”。所以,从这个意义上看“搞怪奖”,不仅是一种另类思维,更是对创造萌芽的善待与呵护。值得期待。

金马在《21世纪罗曼司》说:“在创新将成为人类生存竞争的不可或缺的素质时,依然采用一种循规蹈矩的生存姿态,则无异于一种自我溃败”,“搞笑搞怪”对我们是一个警醒,社会、教育引导规范教育,也要宽容个性;需要标准答案,也要接纳个性声音。让冒尖者、怪诞者也能得到社会认同和赞赏,助推创新发展不断飞跃。